

文庫博物館專集（二十三）

盯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都在谈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史的主

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和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甚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甚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中寻找答案。

◇ 谁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六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中国的中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毕业的年头称呼。人们把当时正在初、高中的这三届即将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按照规定，孩子七岁入小学，经过六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一年的学生是十四岁，在高中三年级的是十九岁。恰恰是美国人最头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teenagers）。这个年龄群体，身心与情智发育迅速，处在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他们强烈要求“做大人”的权力，却不能承担成年人享有这些权力时需要负的责任。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富于幻想，同时具有过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美国近十年来，青少年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国的中学生则处在一个更加矛盾深重的社会现实里。

1966年的这批青少年，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古脑儿的打回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俄国佬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2000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

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杂体，虽然马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共产党员和干部读过那些从西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盲目的相信：我们只要忠心耿耿的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的劳作，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甚么时候会走到？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怀疑过，近似乎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

“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动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所谓“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学校里，学生被学校中的官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管理起来，教育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舞台上，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Role Model），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令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至今难以理喻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但是，根据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对于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应。所谓“

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人。共产党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更深的下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和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意的“保皇派”。

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领导阶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狂妄自大和过份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给老师，声称是路上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锋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为”，使我常常为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作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的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量不断积蓄，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火首先在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

◇ 文革中的“老三届”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异口同声的把帐算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将十年的大动乱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会后效，中、西学人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宫廷斗争，甚至细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给某某打过一个电话，使了一个眼色，写了一个便条……使我不禁想起“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情景。人们似乎忘了，这段历史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继续。其真正“史无前例”性，恰恰在于全国几亿人民统统发动起来折腾，最终“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一九五八年，完全没有科学知识的毛泽东，凭着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发起了一场经济生产的群众运动，名曰“大跃进”。饿死的几百万农民使得毛泽东感到罪过。虽然干掉了“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压住了党内的批评意见，毛却渐渐陷入一种

日益严重的猜疑心态，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公墓里拉出来烧掉以后，毛变得更加恐惧，生怕他死以后，遭到同样下场，一个人陷入这种恐惧症心理，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p e r c e p t i o n）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听他人一句玩笑，都会猜疑人家“别有用心”，这是为什么“文革”以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阶级敌人”，但是中央文件和报刊中的宣传中“阶级斗争”的鼓点却越敲越紧，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不放心。通常的政治斗争，是以利益集团为单位，实际利害的争夺与平衡为内容的，参加斗争的各方势力，至少很清楚对手是谁，但是这种由于最高权威者心态失常而发起的讨伐，使得被讨伐者至死都不明白原由，刘少奇临死前，还书呆呆的争辩“这种把党外的力量弄进党内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违犯党章的。”中国帝王和家长的话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惧症，其思想与行为就更加无法无天、无常理可言了。这种封建礼教的遗产，与“文革”初期发展起来的类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热搅和在一起，把中国推向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如果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将“文革”前后、上下彻底的分析，需要著书，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老三届”这个群体来。

◇ 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

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个毛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有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五年底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他们要作英雄的时候了。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创出条路来。一九六五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十四岁的宫小吉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也没有人去问。

一九六六年三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五月，十几个学生偷偷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经武为首，一〇一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偷偷组织了一个“X一社”，X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X一社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被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社会上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那一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

1966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一年的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学生，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6月初到8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同学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红卫兵的目的是不是

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同我辩论最凶的学生之一，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魏京生。“工作组”找去谈话、强制解放，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派分子”，强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父子、女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解释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夥伴们也是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有人幕后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就锤炼不出真正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起来极其荒唐可笑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的行为。

◇ 红卫兵与红色恐怖

7月26日，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8月6日突然回到了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报仇雪恨。8月8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8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桥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她用极其情感的声调说：“毛主席让我问你们好！你们是小太阳！”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哭了、笑了，发疯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对，被所有的人反对，但是被伟大领袖支持的正确的事情！《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们的文章、他们自己的组织变得全国到处都是。8月18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辈在天安门上同他们握手，还戴上红卫兵袖章，所有画书、电影上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中冲锋陷阵的不再是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变成了他们自己！到此为止，中学生自发的叛逆行为和毛泽东自“大跃进”之后的又一“创举”会合起来，开始了一场皇帝领导子民对其朝廷造反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记得“8·18”那天，我的红卫兵战友们去见毛主席，我却躺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听广播，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边，不再是一间小小教室中的书桌，不再是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的规范之路。革命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感到有些怅惘。

严酷的现实很快的把我拉回地面。“8·18”以后，红卫兵走向社会，开始了一场暴力行为。我的小红卫兵战士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劈啪啪的开始打校长、老师、工作组，甚至自己的同学，路上随便甚么人被指控为“流氓”，一群孩子就会拥上去打。我从小没挨过打也没见过家长和老师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负女生，我都给予坚决地反击。这种侮辱、虐待他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是革命。为了反对打人，我被红卫兵会议批评“落后于群众运动”，应该好好读《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将这些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的争辩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算不算数？对待俘虏还不得打骂、虐待呢。当时任何人想要辩论、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很难开口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和清华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商量写了一个“三校红卫兵联合声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乱打、乱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记得那时一个湿热的夏夜我们坐吉普车去散发传单，车开到西单口上，突然看到一

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车拼命追赶我们，手里拿一张传单。我以为我们的车子掉了什么东西。停下车来那人冲上前来握清华附中卜大华的手，激动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先报出身）。你们写得太好了！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余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一种刺心的头疼。掠过我脑海的话，三十年一直跟我：“红卫兵脱离人民了。”

回想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有三个特点：女生多于男生，初中生多于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温和的人、8月以前作了“保皇派”的学生打得更凶，当时侥幸余生的女子中学校长，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打她最厉害的，是她平时最心爱的学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个当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妈妈，自己的女儿恰恰是她66年时的年龄，这位红卫兵妈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温文尔雅，把女儿管得特别严谨，好象生怕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14至16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加上每个月的周期性变化，是情绪最不稳定的群体。中国的法律当时已经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条件，女孩子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使得社会上仍然用一些压抑她们天性的看法去规范她们的行为。例如，女孩子应该文静、贤慧、顺从。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在她们的心理上形成冲突。平时特别听老师话的女学生，往往是压抑她自身情感最严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卫校领导”的人，8月以后，她们突然变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觉得受了欺骗，平时积蓄的情绪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发泄到过去她们特别敬爱的人身上。有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甚至将亲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一个记录片导演访问了头发斑白的老人——王晶尧，他的老伴——卞仲耘，是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的校长，66年8月，惨死在自己学生手中，访问最后，老人痛不欲生的话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至今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错的吗？”王叔叔，她们知道那是一个罪过，但是，还没有力量回顾这段伤痛，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和宽恕的传统，她们只好将如此的重负压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里稍稍好受一点，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当年受过伤害的所有人面前，说：“对不起。”我们虽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有力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 大串联

“8·18”以后，北京的中学生不单走上了社会，而且，走向全国。这就是“大串联”。大串联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大开眼界。过去，看着别人家干部的孩子跟父母在暑期去度假，我羡慕极了，很想也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但是我的父亲跟周恩来工作了几十年，自己从来不度假，当然更不允许孩子们享受这种“特殊化”待遇。所以，初二的暑假，我同另外两个女孩子到北京郊区的芦沟桥农场干了两个月的“义务劳动”，就那，也是高兴的。背上一个小黄挎包，带一套洗漱用具，几件洗换的衣服，从火车的窗户爬进车厢，（“大串联”时，为了防止拥挤伤人，索性开窗“减压”进人）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也。中国真美呀！厦门、青岛的海滨，桂林仙境般的山水，云南横断山脉中白链子般的山涧和红得象火一样的山茶花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是，真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也在敲击我的心。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苦呀！农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了湖南还遇到了讨饭的人。我们总说要去资本主义国家解救那里的劳苦大众，还去哪儿呀，他们不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吗？所有的革命理想与信奉，第一次在我心底动摇了。从此，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面前的世界，开始质疑所有被灌输的思想，我脚下的地面开始龟裂。

我曾经为此非常的愤恨，认为我们的父辈有心欺骗我们和广大的人民，“文革”以后，我的父亲带领一个团体去加拿大作访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中国。我注意到他老人家回来后的两周内非常沉默。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们的人民生活得真好呀！”因为父亲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使我不由得朝他望去。老人的眼里含有一种深深的歉疚和疑问。是在责备自己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同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工作的如此辛苦，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此后，父亲工作得更加辛苦，直到病逝在医院的最后一息，我想邓小平伯伯第一次访问美国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因为“文革”以前，共产党的干部很少出国。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二十世纪初，他们“勤工俭学”的年代。那时候，欧洲工人生活的确很苦，而且没有保障。他们不明白那只是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市场经济完整化以后，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准，社会主义才能名副其实。如今，西欧实现的才是马克思当年预见的社会。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想跳跃社会的发展阶段，实际是欲速则不达，痛苦万分。

◇ 中学的“派仗”

从1966年8月起，北京市的中学生分成三大派：按照出现的顺序，第一，是以最初自发形成的红卫兵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第二，是“家庭出身好”、但在6、7月份作了“保皇派”的学生，称作“四·四派”，人数最多；第三，是66年11月以后，“中央文革”为了打击“老兵”和他们的父母——老干部达到其篡权之目的，将“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扶起来“闹革命”，他们的组织称作“四·三派”。这批一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才第一次得对了与其它孩子一样的“保卫毛主席”的权力。当然，他们开口的第一个声音，就是要求平等，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代表性文章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曾经给予我的思想解放很大启发。对于他因此而遭杀害，至今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支持或打击着北京中学生的三个不同的派别。致使他们此起彼伏，你上我下，自相残杀，全国的各种地方派别和派仗的情况，大同小异，可谓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这些力量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三派学生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68年伟大统帅的一声令下，所有的中学生结束了派仗，统统开赴农村。

◇ 上山下乡

无论毛泽东当年把这批十几岁的娃娃赶到乡下去的目的是甚么，这几十万知识青年是在中国的黑、黄、红、白土地上开始成人的。大多数学生带革命的热情和决心，打算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结果，他们没有力量改变穷苦的乡村和农民，自己却扎扎实实地被改变了，同农民一起度过的艰辛岁月，使他们每一个人从群众运动的云端落回到地面，第一次开始思索人生与人世的真实含义。

我和另外的四个同学选择在河南辉县插队，背靠太行山，面对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每天，顶繁星上工，披夜露回家，吃自己煮得夹生或烧焦的饭，点着小油灯读几行孟得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冬闲时，扒火车（没钱买票，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时社会上犹如欧洲的中世纪（The Middle Age）一片黑暗，但是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开

始了思想启蒙的征程，69年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种想法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相距太远，在大型的讨论场合，只好用近似哲学推理的方式隐晦的表达。同知心的朋友谈起，也被扣上一顶托洛茨基的帽子，我只好回到文学、艺术的人性解放题目中去。

从农村回来的学生们，开始打破了“派仗”时期的界限，也打破了“文革”以前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隔阂，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都是农民的孩子。一个锅里的小米粥把大家“煮”到一起去了。甚么“黑五类”、“黑帮”子女，统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想当初，《人民日报》天天叫喊“革命大联合”从来无人理睬。此时，共同的理想破灭共同的日晒雨淋，希望和失望的折磨，恋爱和失恋的痛苦，着着实实地把这批青年人连在一起，这种从思想到群体行为的进化，给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

◇ 我当了两次“政治犯”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被抓进监狱两次，做了两次“政治犯”。第一次是1967年，我是18岁，主要罪名是66年底写了一首大骂江青的诗。我听到江青竟敢组织大会，斗争我心目中的大英雄——陈毅伯伯，勃然大怒。陈毅从小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看到他当县官的舅舅打一个老百姓，忍不住大哭起来，他是沙场上威风凛凛的胜将元帅。外交部长当得腰杆又直又硬，给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争了光荣，被这个靠同男人睡觉，爬进共产党来的坏女人欺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提笔写了一首“满江青”，抒发愤怒，“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的诗句表达了很多自己不敢表达的情绪，被传得全国到处都是。1968年我同一大批“学生政治犯”经过“少管所”的“学习班”以后被释放。同期出来的还有“老兵”的董良翮和杨小阳，“5·16”集团的主要干将等人。

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我正在河南医学院读书。据说，我在江青的黑名单上，北京方面又发难下来。“文革”十年里，我始终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黑材料”被人又厚厚的攒了一大堆。被抓的时候，我正在新乡市人民医院里实习。押解我回郑州的路上过黄河，我看到黄河的水少、沙多，很是难过。心想，不知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何时才能清除这些淤积的泥沙，痛痛快快地流向世界的大海。

我知道自己这次是很难活出狱了。索性在提审的时候，和预审员展开大辩论，我的预审员是一个很正直的老头，名叫张子冉，看得出他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时已经感到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因此，每次辩论他都输给我。有一次他气得拍桌子大喊：“到底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实在忍不住笑起来，逗他：“我真的不知道咱俩，谁该审谁。”四人帮”倒台后，我平反出狱。张老头到我父亲那里“告状”，说：“你那傻妞脾气真赖，进了监狱还大吵大闹，继续给自己增加黑材料。我想护她，都护不过来。”

回想当时我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烈士的形象和他那句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和“十七年的教育”Bye—Bye了呢，连我出身的阶级都反掉了，马克思的毛病也找出来了，还不够彻底吗？谁知，在认知、意识层次里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强大，童年被印下的英雄主义，至今在我潜意识的原始情感层次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消失了。

◇ 老三届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中国保持人类历史中，群众运动纪录的绝对世界冠军。几千年来，几百次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地推翻了朝廷，民不聊生就要造反。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又重复老

朝廷的活法，循环往返。直到19世纪，西方的洋人用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才发现比人家落后了好多年。20世纪以来，学生也开始造反。中国共产党的造反运动是“农运”和“学运”的大联合，打下来的天下，留有封建时代农民坐江山的味道，却是冠上了西方思想的帽子——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揉合，以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导演了中国近代史的所有的悲剧和喜剧。在“文化大革命”的“全民运动”中，把这对矛盾推到了极端。粉碎了不实际的理想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今天，我的“老三届”的伙伴已经是四、五十岁进入不惑之年的成年人。他们有的在中国的党、政、军的机关里任要职，有的成为巨型财团的总裁，有的是海外的学者或巨富，有的成为挑大梁的新闻记者，成为校长、教授、老师，有的在最基层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无论他们的职位高、低、人穷、人富，无论他们是在城市、乡村，还是远在大洋彼岸，这一代人，仍然具有基本的同感与共识。

有的人还在担心，生怕这个在60年代震荡过中国的群体，有一天还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其实，作为个体的心理形成，接受环境影响的关键时期（Crucial Period）是人的一到十岁。“老三届”这段年龄，恰恰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段最平静、美好、充满了向上和建设精神的日子。在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无论此后他们经历了何种动荡与苦难，他们的认知、情感的基础，依然根植在建设性的土壤里。相反，最令人应该忧虑的是“文革”时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关键成长时间，是中国充满了扭曲、混乱、是非颠倒、尔虞我诈的年代。这些破坏性因素，渗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爆发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里，“六·四”以后，中国政府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兴奋跳跃的多是30岁以下，45岁以上的人们。偏偏只有“老三届”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中国要想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安定地发展。一次“文革”的教训还不够嘛？人要流多少次血才能学会这个简单的真理呢？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流血换来的。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只能建立在一个数目庞大的，有良好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之上，要想造就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唯一的路是稳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恰恰在于：人们梦想在贫穷和无知的土壤里，种植民主之果。苏联正是还想做一个“民主政体”的跨越，才弄得国破人亡，流离失所。二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会容忍任何人，拿十二亿人的身家性命再做一次实验了。

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新中国的儿女——老三届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和大家一样，我也在辛勤地努力。为了避免“文革”式的社会大灾难重演，为了使亿万受过伤害的心灵得到医治，我正在帮助中国建设一个自己特有的精神卫生系统。为此，成立了威灵基金会—World Link Foundation，给中、美两国的心理工作者架一座交流、互助的桥梁。另外，计划写一本书。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让世人对五十年来的中国，对我们，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也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怎样和新中国一同经历了苦难，而成长起来的。

中国，即将在我们手里成为世界上最富足、强盛、和平的伟大国度。

1997. 3. 8 费城

□ 原载《世界日报》1997 / 3 / 30，4 / 6（标题为：《老三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小雨输入 （读者对本文的意见、评论，可通过本刊或直接送作者YUANXU@AOL.COM。）

∞ ∞ ∞ ∞ ∞ ∞ ∞ ∞ ∞ ∞

女性的野蛮

• 王友琴 •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可能发生。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大字报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

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教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另有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7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

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在大喻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我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设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纸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融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起了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情景。我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融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恐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入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年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1772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

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出一个洞，血就从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在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

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86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

【往事如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我的知青梦 ——一梦八年重返上海

• 嵇 伟 •

多少年过去了，只有在梦中偶尔还会回到那间用黄土垒起的小屋，前半间住着两头牛，后半间用秫秸杆搭起的矮墙后，是我那张用同样秫秸杆遍成的小床。

和牛同住只是我无数次搬迁中的一次，而那张窄窄的小秫秸床，却伴我度过插队的八年。在今天的回忆中，岁月早已熬干了生活真实的苦痛，剩下那片断的记忆就象夹在纸页发黄的旧书中那瓣早已辨不清原色的干花——真实，却易碎而无色无味。

### 一、和牛同住

文革开始时候我已经懂事了，父亲成了牛鬼蛇神，我唯一的亲伯父割腕自杀。我们这代人看到过那么多亲人、熟人和陌生人的死于非命，死于革命，然后，革命就轮到我们头上了。

15岁那年我被分配到安徽淮北插队。记得那是三月的一个午后，很好的阳光照在上海彭浦车站铁色的顶棚上。我站在车窗前看这阳光下的铁色的顶棚缓缓后退，又看父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挥手追着跑。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看上去那

么伤心，尤其当他们发现火车越开越快而他们却再也追不上的时候。我想我会从那天起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为毛主席的号召而活着生命。

也许不仅活着，也许还会去死。我有一个少年时的玩伴徐蓓蓓，比我大三岁，留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一直是我这个黄毛丫头的崇拜对象。她和弟弟住在爷爷家，她爷爷是个翻译家。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我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比我早两年到江西去插队，去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救当地的小孩而淹死在潭里。据说是夹在潭中的石缝里而憋死的，死时全身青紫。我看见她的爷爷一夜间老了十岁，从此变成一个无言而驼背的影子。

我去的地方在淮河的支流茨河边上，一个很穷的小村庄。刚去时没有地方住，队长就把牛棚腾出一半来，用秫秸杆一拦，后半间就成了我的卧室，一张小床，两个妈妈给我的箱子，还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在牛棚里的第一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半夜牛反刍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以为是什么鬼怪之类，差点吓得哭起来。

事实上象我这么大的上海女孩看见一只小青虫都会惊叫的。

很久以后当偶尔回忆起插队的日子，最先回到脑海里的总是一副这样的画面：我和十来个农民一起，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拉犁耕地。我们躬着腰，每人背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用并不太大的力气拉动那具木犁，就象通常牛们做的那样。我们生产队只有两头牛，春耕时忙不过来，只好用人代替。其实拉犁时我从不花大力气，因为人多容易混。但在永远的记忆中却总觉得代替牛拉犁看起来有点惨。

## 二、南京之歌

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点惨。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家。在农村我们是被教育的对象，而且因为我们的出现，农民减少了口粮的分配，所以农民并不欢迎我们。在家里我们成了拖累家庭的负担，我们挣不到自己的口粮，挣不到回城探亲的路费，所有这一切父母都要替我们付。城里人把我们看作祸害，街道办事处干部一天来两次催：为什么还不回乡下？不要在城里闲逛！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我们被勒令全部返回农村，怕我们去美国人面前做出什么有失体统的举动。

而我们习惯了所有的轻视敌意和侮辱，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怎样轻松地生存。初来插队时所有的理想都随着这些轻视和侮辱远离我们而去，剩下的是孤独和玩世不恭。

前队有几个男生，一到粮食吃完的时候，就坐到队长家门口要吃的，后来这招不灵了，队长告诉他们如果再提前吃完口粮，只有到大队部去要，生产队再也没有粮食可给了。男生们一听，二话不说，拿这一根绳一个筐，转身就去了大队部。到了大队部，自然是不可能要到粮食的，他们也不多说，把带来的绳子往梁上一挂，拧一个活扣，其中一个男生往凳子上一站，伸头就要上吊，吓得大队长立即叫人称了一筐高粱给他们。

知青们上街赶集通常是卖柿子卖鸡蛋的农民的灾难，几个知青往摊前一围，一个和摊主讲价，另几个就遮遮掩掩的往口袋里塞柿子鸡蛋，然后一轰而散逃之夭夭。

有一度我时常被邀请到邻队的几个知青那儿去吃鸡。那时吃鸡是贵族的生活。



我们普通人一年都吃不上一只鸡。而我被邀去吃的那些鸡都是他们半夜走几里地到别的公社，从农民的鸡圈里偷出来的。有一次他们还计划用半斤泡了白酒的馒头偷一只猪，后来事发，猪没有偷成，却被绑在树上狠揍了一顿。自然从此以后鸡肉也就绝迹了。

偷东西也好，上吊威胁也好，本质上其实是青春期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的表现。还有一种发泄就是唱歌。我想所有的知青都曾有发疯般地在落日的田野或夏夜草屋前空地上大唱知青之歌的经验。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唱过样板戏，却能唱全《外国民歌二百首》。

一个晚秋的傍晚下着阵阵冷雨，满地泥泞中走来两个南京知青。我从烟雾弥漫的灶边抬起头，虽然我们从不相识，但这是规矩，赶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客人。揭开落满苍蝇的锅盖，我给他们盛了一碗红薯——这也是我的晚饭。就是在那间晃着昏暗油灯光的灶间里，为感谢我的饭，那个有一对忧郁黑眼睛的南京知青教给我唱这首后来几乎流传在全国知青间的著名的《南京之歌》。那略带忧郁无奈却有又坚定沉重的旋律，至今会不知不觉回到我耳边。

半年过去了，听人说在我那儿吃过饭的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南京之歌的作者，已经被抓进去了，判了十五年刑——文革以后我们听说他死在监狱里了。

那年的夏天，顶着八月的烈日，我戴一顶草帽，背着一个军用书包，从安徽到南京去找他，我拿着什么人给的地址去雨花台附近找，人们却告诉我没有这个人。暮色降临了，我仍在街边徘徊，只觉得又热又渴又累。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得很重，我不知道或没有钱住旅社没有钱买车票。我睡在火车站的石凳上发着高烧，脸上已经发出满脸红点。不知多久以后，一个扫地的大妈叫来了警察，我被送回上海，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当父亲从医院把我接回家时，我已经足足六天没吃过东西，然后开始吐血和昏睡。

我至今仍不知道他是否真是《南京之歌》的作者，只记得他那双略带忧郁的深深的眼睛。

### 三、牺牲者

82年我大学毕业前，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奇瘦的高个子男人到学校找我。他说：七年了，你没变。

我惊愕地看着他，那张奇瘦而冷峻的脸慢慢抓住我的回忆，而回忆中，他的脸青春而温暖。

那是1975年的事。他姓秦，原来住在上海成都路附近。他和我在同一个公社插队，表现积极。后来我们大队从1973年起每年都有一名女知青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生，回上海或去合肥念大学。每年的那一天看着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向县城方向远去的背影，我总会羡慕的几夜睡不好觉。

我想上大学，我想回上海，但问题是所有被推选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仅要表现积极，还都是大队书记的好朋友。我从小不爱体力劳动，表现积极当然是谈不上了。而且我还不喜欢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长得挺英俊，但笑起来时的表情令我害怕。我总是这样幼稚地安慰自己，我是全县知青中最小的，等到所有的知青过了二十五岁上大学的年限，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机会了。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全国高考制度就恢复了，78年我自己考回上海的

华东师范大学。在这之前，77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听说大队书记被县公安局抓去了，因为最后一届被推荐回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怀孕了。经调查，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四、五个——也许更多？——女知青有过这样的关系。

当初和现在我都从未谴责过那些女知青，尽管事实上她们可能占了我招工招生的机会，我想她们是比那个团委副书记更惨的牺牲品。在她们一辈子的生命中，永远会背负一种道德的负罪感，也许？

#### 四、历史没有结论

也许历史和人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来评判？几乎整整一代人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在贫瘠的农村，许多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十七岁时我有个男朋友是上海最出名的年轻人，他的弟弟在黑龙江兵团，1975年或者是76年在黑龙江被枪毙，罪名我不知道。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的儿子当时在黄山茶林场，他的女朋友陆华和另十一个女知青为救灾——救什么灾我不知道——全部死去。而他后来因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死去的陆华胸前而被批判：毛主席像怎么能跟着下葬？！

人们说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今天中国大陆最出色的作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几乎全是当初插队的知青，是否这又该归功于农村插队呢？

文革过去了三十年，对中华民族，这三十年中的改变超过了几个世纪，可是在今天有谁能评判这个改变的是与否呢？

仅仅纪念过去其实已经足够了。

□ 原载《天下华人》1996年7/8月号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 校对：    | 钟 超（美国）  | <cm-ee@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美国）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冀 城（加拿大） | <cnd-info@cnd.org>    |
|           | 余子坚（美国）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cnd-cord@cnd.org>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cnd-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 F T P ) : ftp.cnd.org[149.159.2.6]: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 W W W ) : http: //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